

# “比”：乡村水利工程建设民众动员的内在逻辑

## ——基于1952—1953年整修南洞庭湖工程的历史考察

陈向科, 杨博坤, 郝翔

(湖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逻辑的基本概念“比”, 基于1952—1953年整修南洞庭湖工程民工动员个案, 分析乡村水利工程建设民众动员中蕴含的内在逻辑: 工程指挥部建构志愿军榜样形象和民工模范形象, 作为“比”的参照点, 同时侧重建立志愿军“上战场”与民工“修堤垸”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 基层干部通过对情感、年龄、政治面貌、价值、场景因素的强化, 引导民工“比”的行为, 使之争做志愿军式英雄和李祖范式模范; 民工出于对参照点的认同, 将“比”化为自觉行动, 提高了思想认识, 提升了劳动工效, 增强了政治认同。这表明, 只有真正符合“比”的逻辑, 注重“比”的合理性, 实现“比”的升华, 才能更好地达到“比”的目的。

**关键词:** 水利建设; 民众动员; 洞庭湖区; “比”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3)04-0040-09

# “Comparison”: the underlying logic inherent in mobilizing migrant workers in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project—Based on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outh Dongting lake reconstruction project from 1952 to 1953

CHEN Xiangke, YANG Bokun, HAO Xiang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ison” in the log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thinking and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mobilizing migrant workers in the South Dongting Lake Reconstruction Project from 1952 to 1953,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logic inherent in the mass mobilization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l images of the volunteer army and migrant workers by the project headquarters, serving as the reference point of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establishing a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ehavior of volunteer army’s “going to the battlefield” and that of the migrant workers’ “repairing dikes and embankments”. Through the reinforcement of emotion, age, political affiliation, values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grass-roots cadres encourage th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ntext of “comparison” to strive to be volunteer military heroes and the role models like Li Zufan. Meanwhile, migrant workers, out of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reference points, have transformed “comparison” into their conscious actions, enhanced their ideological awareness, improved labor efficiency, and strengthened their political identity. This indicates that only by truly following the logic of “comparison”, emphasizing the rationality of “comparison”, and achieving the sublimation of “comparison”, can the purpose of “comparison” be better achieved.

**Keywords:**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mass migrant workers; Dongting Lake District; “comparison”

民众动员是指国家、政党或社会团体通过思想发动而充分调动民众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以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的活动, 包括

动员的领导机构设置、组织实施、机制形成、成效检验等系列环节。

在科技水平、机械设备和经济条件均十分有限的集体化时代, 切实有效的民众动员使得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成为可能。这一时期, 国家兴修水利延续了革命时期民众所熟知的一些动员方式, 如以会议

收稿日期: 2022-1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ZS129)

作者简介: 陈向科(1975—), 湖南华容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水利社会史研究。

动员、报纸广播、节目巡演、电影放映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并通过对经典文献的学习、先进典型表彰等形式加强对劳动者的思想教育，以各种生产竞赛、誓师大会的方式激发劳动者的建设热情。工地上的广播、宣传栏、黑板报等设施，以及四处张贴悬挂的标语，共同营造出浓厚的建设气氛。这为乡村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sup>[1]</sup>。同时，“提高工资标准与实施物质奖励”，兼顾民众的利益诉求，提高了水利工程的质量和工作效率<sup>[2]</sup>。在动员机制方面，乡村水利工程建设通过国家与农民双向互动，情感与利益交织，形成以国家为主导、农民积极参与的动员机制<sup>[3-5]</sup>。

学界的上述成果反映出，对乡村水利工程建设民众动员的研究由宏大叙事趋向微观剖析，由动员方式梳理趋向动员模式探讨，由动员效能分析趋向动员效能检视，然而，乡村水利工程建设民众动员蕴含何种内在逻辑有待揭橥。为此，笔者拟引入中国传统文化思维逻辑的一个基本概念“比”，基于1952—1953年秋春之际整修南洞庭湖工程民众动员个案，探讨乡村水利工程建设民众动员的内在逻辑、成效及其对新时代乡村水利工程建设启示。

## 一、“比”的生成：工程指挥部对参照点和逻辑关联的建构

“比”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思维方法。在人的逻辑思维过程中，不论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研究，还是对客观事物认识结果的表述和论证，都大量地运用着“比”这种方法<sup>[6]</sup>。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思维逻辑也是一种“比类逻辑”，表现出鲜明的直观性和具象性。其主要特征是在思维的起始树立一个具有权威性与合理性的参照点，用于比照被论证的事物，从而建立事物间的逻辑关系<sup>[7]</sup>。也可如是理解，“比”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递进的过程。在一个周期内，“比”的起点是人们对参照物的选择，过程为“见贤思齐”“比学赶”，终点为继承与超越。

“比”作为民众动员的逻辑，包含主体、客体、参照点三要素，自有其运行机理。首先是树立“比”的参照点，如英雄、榜样、模范、先进、典型、标杆等。动员主体还会根据动员客体的特点，针对性地重塑参照点的形象。其次是建立参照点与客体之

间的逻辑关联。尽管起始的参照点具有权威性，但参照点与客体间的逻辑关系并非不证自明，仍有勾连之必要。再次是激发、引导客体“比”的意识和行为。主体一般通过组织各类对参照点的效仿活动，引导客体“比”的行为。最后是客体即民众对“比”的认知与行为，认同或否认，响应或规避。这在1952—1953年整修南洞庭湖水利工程民工动员中得到充分体现。

整修南洞庭湖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最大的水利工程。起因为1952年9月的南洞庭湖溃垸灾害：湘资尾闾大部分堤垸相继溃决，淹没耕地20余万亩，受灾人数达10余万人。湘阴县受灾尤甚，“1600多人被洪水吞没，沿堤的各个角落，遍布尸体”<sup>[8]</sup>。灾情发生后，中共中央迅速做出整修南洞庭湖的决定。11月10日，成立南洞庭湖整修工程委员会和整修工程指挥部（以下部分简称“指挥部”）。工程自12月10日开工，共动员21个县市群众25万人、各级干部1万余人参加，由此拉开新中国治理洞庭湖的序幕。

从整修南洞庭湖工程的筹备和实施看，筹备1个月即开工，25万民工的动员集中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开工后，少部分民工因生活不习惯、认为与自己无关、缺乏修堤经验，工程时间紧（须在春耕前完成）、任务艰巨（没有机械施工、全靠人力），气候恶劣（天寒地冻、北风凛冽）等主客观原因，一度产生思想波动，或装病不出工，或私自逃跑，严重影响工程进度<sup>[9]</sup>。为稳定民工情绪，提高民工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激发其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处于领导者层面的动员主体——指挥部，结合国内正轰轰烈烈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和民工思想认识实际，树立志愿军榜样和民工模范，作为动员民工的参照点，并着力架构志愿军“上战场”与民工“修堤垸”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

### （一）参照点的树立

通过塑造榜样模范形象，树立“比”的参照点，团结和教育民众，引领价值导向，服务中心工作，是中共民众动员的重要方法和旨归。毛泽东将榜样作为开创事业的先锋和鼓舞斗志的旗帜，强调“拿出个榜样给群众看”，充分发挥榜样的引领和教育功能，从情感上感染群众，在行动中带动群众<sup>[10]</sup>。就1952—1953年整修南洞庭湖水利工程民工动员

而言,志愿军榜样和民工模范就是引导民工思想和行为的参照点。

### 1. 志愿军榜样:远方的参照点

指挥部通过自办工地报纸、文艺宣传、放映电影、赴朝慰问团代表来工地作报告、从前线归国的退伍志愿军现身说法等形式,建构起志愿军维护祖国和人民利益的“爱国者”、英勇顽强与不畏艰难困苦的“英雄汉”、乐于帮助友邻的“国际主义者”形象。

其一,志愿军是视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者”。针对民工对整修南洞庭湖工程的意义认识不清问题,塑造志愿军的“爱国者”形象,强调志愿军为了祖国和人民利益踊跃参军、勇于献身的爱国情怀,以此比照,激发民工的爱国热情。

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空前踊跃地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事迹,新的战斗力量不断参加到志愿军的队伍中去”<sup>[11]</sup>,体现了蓬勃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指挥部对此进行了重点宣传。在工程指挥部刊印的《南洞庭报》和各总队的油印小报中,志愿军“远离家乡和父母亲人,舍小家为大家”的感人事例比比皆是。1953年初尽管没有志愿军题材的电影公映,但指挥部放映了16部国产和苏联影片,每场观众平均3000人,总计达120万人次。放映前通过广播进行广泛宣传,“志愿军就是以前革命年代的战斗英雄”,像《光荣人家》中的田老头、《胜利重逢》中的耿海林、《中华儿女》中的八个女英雄、《钢铁战士》中的张排长、炊事员老王和通讯员小刘”<sup>[12]</sup>“志愿军就是捍卫祖国和人民尊严的最可爱的人!”<sup>[13]</sup>

其二,志愿军是英勇顽强与不畏艰难困苦的“英雄汉”。针对民工的畏难情绪,树立志愿军的“英雄汉”形象,强调志愿军在战场上斗志昂扬,能战胜一切困难,作战英勇,不怕牺牲,以此对照,激励民工克服困难,发挥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是作战环境极端艰苦和残酷,但志愿军意志坚如钢铁,充分发挥战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浴血奋战。《南洞庭报》中,随处可见志愿军如下事迹:“为了战斗的胜利,他们忍饥挨饿,一把炒面一把雪;为了战斗的胜利,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徒涉冰河,冲向敌阵。”<sup>[12]</sup>尤

其是1952年10月中下旬的上甘岭战役,“巴掌大的阵地,敌人的炮弹轰了几个小时,石头被炸成粉末,我们的阵地被炸塌几米”。后来志愿军战略性地转入坑道作战,“但时间长了,坑道内什么都缺,缺水、缺粮、缺弹、缺药品、缺氧气,战士们胸口闷,嘴巴都裂开几道口子”“没有水,志愿军战士就互相喝尿解渴,还戏称为‘光荣茶’。缺少炸药爆破,战士们就趁夜色掩护爬出坑道搜集没有爆炸的炸弹回来拆卸”“有些战士成了铁匠,靠搜集敌人的弹片,办起了铁匠炉,自制了铁锤铁钎”。最终,“克服无数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夺取了胜利”<sup>[12]</sup>。二是武器装备落后于敌人,但志愿军迎难而上,想方设法消灭敌人。慰问团代表们在报告中宣讲,“我们的大炮不够,飞机、坦克还缺乏,但志愿军战士英勇顽强,敢于近战、夜战,善于想办法,用炸药,拼刺刀,投手榴弹,不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sup>[14]</sup>“这些生动的故事深深地感动着全体民工和干部同志,特别是关于坑道战士高云和、冷枪神手吕仲和,还有关于用身体堵塞枪眼的战斗英雄黄继光和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等同志的英雄事迹。同志们听了之后,纷纷‘要向志愿军学习!’”<sup>[15]</sup>

其三,志愿军是乐于帮助友邻的“国际主义者”。针对民工认为整修南洞庭湖工程与己无关的认识,勾勒志愿军的“国际主义者”形象,强调志愿军除了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外,还帮助朝鲜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以此参照,引导民工提高“天下农民是一家”的阶级觉悟,团结互助,以饱满的劳动热情整修大堤,以实际行动帮助湖区受灾群众。

一是日常生活上帮助朝鲜老百姓。当时,在整修南洞庭湖工地,有许多从朝鲜战场归国的退伍志愿军,他们在工地既是劳动骨干,也是热心的宣讲员,在劳动空隙向民工讲述志愿军在朝鲜英勇作战之余帮助朝鲜老百姓的事例。“志愿军和朝鲜老百姓真亲密得像一家人。志愿军想起朝鲜老百姓的灾难深重,每天都节省米给朝鲜灾民吃;朝鲜灾民更好,他们把米退回来,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志愿军同志,你们留着自已多吃一点,好多打几个美国鬼子!’我们听了更加感动,那样的国际主义的友爱精神,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sup>[16]</sup>二是生产上帮助朝鲜老百姓。“在朝鲜前线到处都看到听到我们英雄的志愿军那种舍身救人和帮助朝鲜老百姓的一些英雄行

为。如开城附近有一天暴雨，七岭洞的洪水冲决了堤，两岸的稻田，就一亩亩地陆续被洪水淹掉了。”志愿军战士“一个个地跳进水去，肩并肩地挤在一起，用身子把决口堵住。另外的一些战士忙用石头、木板等，很快地把决口的地方堵起来，抢救了河堤，使许多稻田免于洪水灾害”“还有我们某部志愿军，在冬天帮朝鲜老百姓修筑堤坝”<sup>[16]</sup>。三是舍身救人。最广为人知的是罗盛教的英雄事迹。指挥部组织了学习罗盛教的专场报告会，文艺工作者将罗盛教的事迹编为弹词，在工地弹唱，“罗盛教，了不起！冰天雪地寒彻骨，异国他乡救子弟。爱国爱民是模范，朝鲜人民共感激。我们来工地，要向他看齐。同心协力筑新堤，消除水灾为人民。同心协力筑新堤，消除水灾为集体”<sup>[12]</sup>。

## 2. 民工模范：身边的参照点

对民工来说，志愿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令人感动、钦佩。然而，志愿军远在朝鲜战场，其令人景仰的先进事迹和光辉形象，是在宣传员的嘴里、工地报纸上、工地的喇叭中，于民工难免有遥不可及、“高不可攀”之陌生感，“只可远观不可亲近焉”。为此，指挥部在已有志愿军榜样参照点的基础上树立民工模范，作为民工身边“眼见为实”的参照点。

其一，乙等、甲等模范。乙等模范，其基本条件是“凡工作一贯积极、劳动或工作中能主动克服困难，经常起带头作用，在群众中有威信，对工程建设有突出成绩”；甲等模范，指“合乎基本条件，又能经常积极想办法、出主意、提出新的合理化建议或创造，因而对工作推动作用大，功绩重大者”。按照工程指挥部政治部最初的设计，这两类模范占民工总数的1.5%<sup>[15]</sup>。而在实施过程中，“共涌现出各级功臣、模范近万人”，约占民工总数的4%<sup>[17]</sup>。

其二，特等模范，系指“合乎基本条件，又有重大的创造发明或在意外紧急情况下冒险犯难，功绩卓著者”，占模范总数的20%。主要包括三类群体：一是与志愿军有紧密关系的模范。如湘阴特等模范马有志，本身曾是志愿军，1952年4月因大腿受伤从朝鲜前线回国，主动报名参加整修南洞庭湖工程建设，在工地劳动积极，冲锋在前。岳阳特等模范游树堂，其儿子当时正在朝鲜作战，系志愿军某部四营3连炮兵战士<sup>[15]</sup>。二是“明星”模范，如李祖范、陈代杰等。其中，李祖范系桃江总队六大

队五中队三分队副分队长。该县民工均系山区农民，对在湖区修堤毫无经验。开工初期，在劳力组合、施工配合、技术掌握上存在诸多问题，工程进展缓慢。五中队开工后9天工效平均只有1.21方。李祖范“感到问题严重，开始考虑到劳动组合和操作方法的改进问题”。12月21日，他在报上看到益阳12大队由于按劳编组，工效提高到4.8方的消息，马上和全队民工商量效仿。分队青年多，好胜心强，傅希元等主张试试看，但有些民工保守思想严重，坚决反对。在李祖范的耐心解释和说服下，经过“民主讨论，自愿结合，按劳动力强弱编组”，人均挑土5.2方，创造了全工区挑土的最高记录。后经桃江总队“培养、指导，总结出李祖范小组十条经验”“树立起李祖范小组这面旗帜”<sup>[15]</sup>。三是各总队涌现出的模范，如桃江特等模范华柏泉、沅江特等模范郭迎春、华容特等模范陈天照等。

通过如上方式，指挥部成功塑造了两类参照点：志愿军榜样和民工模范，前者是“爱国者”“英雄汉”“国际主义者”，后者是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攻坚克难者、功绩卓著者，均具有理想性、先进性的特质。这在当时全国上下学习“最可爱的人”的浓烈氛围中，在相对封闭的工地场域，志愿军榜样和民工模范无疑是动员民工比照的理想参照点。

### (二) 参照点与民工之间逻辑关联的建立

参照点树立之后，确立参照点与民工之间的逻辑关联就尤为重要。考虑到民工模范直接来源于民工队伍，二者的关联是自然而然的，而志愿军这群“最可爱的人”远在朝鲜战场，民工不甚明了志愿军与自己究竟有何关联，因此，指挥部重点在目的、环境、行为三个方面，建立志愿军“上战场”与民工“修堤垸”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

1. 目的关联：都是为国家和人民，由此激发民工“与有荣焉”的荣誉感

通过油印小报、广播筒、有线广播、黑板报等方式，强调志愿军出国作战和民工出工“是同一个道理”，目标一致。志愿军是为保家卫国，“在朝鲜前线为中朝人民及世界人民在冰天雪地打美帝”。民工则是为建设国家、保护粮仓，坚毅地走上战斗的前线，积极参加治湖工程。“我们到滨湖来修堤，除了帮助灾民兄弟重建家园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建设国家。滨湖是国家的粮仓，平常

我们帮自己家里修谷仓，总是要搞得熨熨帖帖，不留一个口子进老鼠。现在我们来建设国家的粮仓，不也正是同一个道理么？”从而使民工“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更深刻地认识到自身在人民国家和治湖工程中的地位和责任”“把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治湖工程当作自己无上的光荣”<sup>[15]</sup>。

2. 环境关联：志愿军困难更甚，由此激起民工克服困难的斗志

通过读报组、幻灯放映、图片展览、工棚文娱等方式，强调志愿军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困难，令民工感同身受的同时“见贤思齐”。志愿军远在朝鲜，生活更为艰苦，面临的环境更为残酷，“零下40度，吃干粮，吃冰水”，“经常在几尺深的雪里工作；有时还是日夜在搞。挖战壕，拖钢板，战友们愉快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志愿军在前方搞了3年，年年在战场上过春节，还要打美国鬼子，我们在工地上过一个春节，想什么家呢！”<sup>[15]</sup>“这就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决不能向困难低头，朝鲜前线的志愿军不是比我们更苦吗？”“到洞庭湖边上修堤，当然不比住在家里好，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比在朝鲜战场上打仗的志愿军呢？我们去洞庭湖，那里吃的住的，政府都安排得很周到。再说，洞庭湖一带的气候和全省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志愿军为了我们的和平生活，忍受一切痛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来支援志愿军，而忍受一点点痛苦呢？”<sup>[18]</sup>

3. 行为关联：民工上工地好比志愿军上前线，由此生发民工劳动行为的神圣感

通过归国的赴朝慰问团代表的报告会、花鼓戏演出、弹词组、山歌快板等方式，强调志愿军在前线作战与民工在湖区整修南洞庭湖是两种殊途同归的爱国行为。“同志们，志愿军去朝鲜抗美援朝，消灭美国鬼子，是保家卫国。我们在这里整修南洞庭湖，挑爱国土，是保卫湖区人民不再受水灾的危害，也是爱国。”<sup>[19]</sup>指挥部发布的各类通告也向民工表明，“我们治湖和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一样”“多挑一担土，就等于多打死一只美国狼”“多打一遍碾，就是多增加一分抗美援朝的力量”。这从民工给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的信件也能够看出：“我们大家修堤筑，建设好祖国的粮仓；我们一齐加油干

呀，工地里春节喜洋洋。我们的锄头是刀枪，我们的工地是战场。你帮助我来我帮助你呀，多挑一担土，就等于多消灭一只美国狼。”<sup>[15]</sup>

## 二、“比”的施行：基层干部对民工“比”的行为引导

按照行为主义的集团压力理论，个体大部分行为是所处环境诸因素作用的结果，通过调控人们行为的外界环境的可变因素，就可能引出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表现出来的行为<sup>[20]</sup>。整修工程中，指挥部下设常德、湘潭两个分指挥部，再以县为单位，成立民工总队；区或联区为大队；乡或联乡为中队，自然村为分队，分队下设班(组)，每组10人。正副大队长及教导员、正副中队长及政治指导员、正副分队长等基层干部<sup>①</sup>，属于执行者层面的动员主体。这些基层干部对民工“比”的行为引导，正是通过强化某个“可变因素”而实现的。

### (一) 情感联结引导：与志愿军通信

与作为参照点的志愿军进行通信往来，是一种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联系方式。这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民工与志愿军之间的情感联结，促使民工将对志愿军的敬仰之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仿行为，是基层干部引导民工“比”的行为的突破性环节。

在整修南洞庭湖水利工程的短短100天，在紧张忙碌的“挑堤”空暇，基层干部、民工与志愿军往来信函8封。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湘潭县乌石乡干部民工与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的信件往来。1953年1月22日，在工地的乌石乡干部和民工写信给彭司令员，介绍他们自1952年12月参加南洞庭湖整修工程的一些情况，重点报告他们是如何受志愿军英雄事迹的鼓舞，发扬志愿军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劳动竞赛，克服各种困难，提前完成修堤任务的，如学习了“很多志愿军的英雄事迹。这些事迹鼓舞着我们全体民工”“碰到困难时，我们就拿志愿军来比”“我们到了新工地，棚子没有搭好，我们暂时住在民房里，就学了解放军的样，每天把屋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有的同志还帮房东挑水。工地的农民们都称赞我们：‘这真是模范队，不愧是彭德怀司令员故乡的人！’”“大家提了一个保证：要多挑土来迎接春节，学习志愿军的精神，不修好南洞庭湖决不回家。”<sup>[15]</sup>1月30日，彭德怀

司令员回信，感谢乡亲们对志愿军的关怀，并勉励民工：“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打击美国侵略者，是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而祖国建设事业的胜利，又加强了抗美援朝的力量，鼓舞了志愿军的战斗意志。我们应当在抗美援朝斗争和国家经济建设的两个战线上，互相竞赛，争取更大胜利。”这封信极大地激励了乌石乡干部群众的劳动干劲，“引起他们无限的欢欣鼓舞”“向彭司令员提过保证，一定要更加积极地干”“志愿军轻伤不下火线，下小雨我们一定不停工”，这样“我们又又有成绩可以写信告诉彭司令员了”。

除了写信给志愿军领导人，还有整修工程工地上的劳模父亲与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儿子的通信。如岳阳4大队32中队民工游树堂，在治湖工程中不畏艰苦，处处带头，被评为特等模范，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无比激动，写信给在朝鲜作战的儿子志愿军某部四营3连炮兵战士游汉春，向儿子提出竞相立功的挑战：“我40岁了，光荣地参加了党，得了特等模范，家里接到了喜报。我保证争取取上加功，坚决前进，修好洞庭湖才回家。你呢？你是光荣的志愿军，你一定要多杀些美国鬼子，争取立功入党，家里等着你的喜报！”<sup>[15]</sup>

### （二）同龄与特定身份引导：开展青年民工学习英雄团员黄继光活动

根据志愿军英雄和青壮年民工年龄相仿、部分为共青团员的特点，组织年轻民工学习青年志愿军，尤其是共青团员英雄。这是基层干部引导青年民工“比”的行为的重要环节。

1952年11月，黄继光在朝鲜战场奋不顾身的英雄事迹被广泛传播<sup>[21]</sup>。因为黄继光的团员身份，基层干部在青年民工中开展了“学习英雄团员黄继光”活动。“团内外青年在中队长的带领下普遍地学习了黄继光同志的事迹，施工面积最大的湘阴工区，团员就是通过比黄继光，扭转了松气思想，鼓舞了青年向塌陷作斗争的决心与信心。如民工李敬国说：‘黄继光身上打了几个洞，还坚持战斗，但我一遇到困难就哭脸。他也是为祖国，也是个青年团员，比起他来我就不够团员条件。’说着，提出保证，表示决不松气，坚决干到底。他的觉悟对扭转同队民工的‘回家’思想起了很大作用。”<sup>[15]</sup>常德青年民工也统一“学习志愿军英雄黄继光的英勇事迹，这种

精神，就很快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中”。“3月5日晚上涨水时，常德总队牛坝基围水堤冲溃了，正在看守的团员郭堤堂毫不犹豫地连衣跳到水里，将身体堵住溃口，并说：‘志愿军青年团员黄继光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生命，用身子堵住敌人的枪口；为祖国修建‘粮仓’，我用身子堵住溃口，这算什么！’这只是千万个青年中的一个，表现这种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典型，是数不完的。”<sup>[21]</sup>

### （三）塑造价值与创设情景引导：劳动竞赛

劳动竞赛是将志愿军榜样、民工模范这两类参照点的行为和精神塑造成集体的行为准则和共同价值，并化为整个民工共同行为的一种有效形式。这是基层干部引导全体民工“比”的行为的核心环节。

自民工大队、中队到分队、班(组)，逐级开展劳动竞赛。“在500多里的堤线上，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喇叭里不时地播送着工地的新纪录和志愿军式的模范人物事迹，‘百战百胜英雄中队’‘钢铁小组’‘夺红旗小组’‘模范小组’等等，先进事迹层出不穷。”工地上到处听到顺口念出来的快板：“都来学习志愿军，克服困难立大功，大家齐心合力干，个个争取当英雄。”<sup>[15]</sup>平江总队一大队“在全大队组成许多个以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等战斗英雄命名的劳动小组，展开了以比工效、比质量为中心的劳动竞赛”<sup>[23]</sup>。

除了志愿军，特等模范李祖范、陈代杰等也是民工劳动竞赛的参照点。各民工大队“用草皮做墩子，用芦竹做架子，在大堤上摆起了擂台。大家的心气都很高，都想在气势上压住他人”。岳阳“五大队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工棚上：‘拳打三七单位（即三大队、七大队），脚踏平浏总队（即平江、浏阳治湖总队）’。我们三大队不甘示弱，大家摩拳擦掌，接受挑战，也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工棚上：‘迎挑战，对准五大队；夺红旗，算我三大队’”。民工中队、分队除了给每人佩戴一条白底蓝边、写有口号的布条外，每天还公布各队取土进度。“年轻人好胜心强，你追我赶，总想拔得头筹”“我不信邪，我也能挑！”<sup>[24]</sup>“我们五谷坳的人，输过哪个？”<sup>②</sup>民工小组层面，则组成多个以李祖范、陈代杰等模范命名的劳动小组，“比工效”“比质量”。在劳动竞赛进入高潮时，整个工地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热气腾腾，“早出工、晚收工，争当模范上北京”“比进

度、比质量,修堤就是建粮仓”“抓晴天,抢阴天,麻风细雨是好天”等口号响彻云霄。总之,“随着劳动竞赛的开展,光荣感在广大民工中普遍树立,立功做模范成了诱导农民前进的动力”<sup>[25]</sup>。

### 三、“比”的参与:民工对“比”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作为“比”的运行逻辑另一端的客体,民工对于“比”的参照点认知、认同以及由此激发的效仿行为,对于“比”之目的达成至关重要。静态地看,对于志愿军榜样和民工模范,民工愿意积极主动与其“比学赶超”者有之,被动与其“比肩”者有之,随大流参与者有之,假意“佯比”者有之,质疑逃避者有之。动态地看,民工向榜样模范看齐的态度也并非一成不变,有自始至终热情参与者,有起初满腔热情、继而热情退却者,有开初游移不定、而后跃跃欲试、进而踊跃参与者,也有冷眼旁观者。但总体而言,以主人翁姿态积极投身水利工程建设者占主流。这集中体现在民工对参照点的认同、“比”的程度上的优化等方面。

#### (一)“比”的认同:对志愿军榜样“照样做一做看”

应该说,指挥部对民工动员参照点的选取上颇为周密,既结合了当时国内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又考虑了民工的思想认识特点。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民工不会全然按照指挥部“比”的逻辑行事,而自有行动逻辑。对于远在天边的志愿军榜样和近在咫尺的民工模范两类参照点,民工的选择更倾向于志愿军。

材料显示,民工更乐意参加与志愿军“比生活环境、比奋斗精神,比功劳贡献”的“三比”教育。“到洞庭湖边上修堤,当然不比住在家里好,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比在朝鲜战场上打仗的志愿军呢?”“志愿军在冰天雪地中作战,有时还吃不上饭,我们在这里三餐有吃,还不努力干,对不起志愿军和毛主席啊!”<sup>[12]</sup>“三比”之后,在前一阶段,认为治湖是件“苦”事、既怕湖风又怕雨雪的民工,“都觉得这种想法不对,和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艰苦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事”。沅桃总队三大队的民工说:“我们最苦也比高云和同志好多了,总不会有五天五夜在坑道里喝不到水的事。”醴陵总

队引导民工学习“志愿军的英勇艰苦奋斗精神,认识到自己的生活、工作都比志愿军舒服,因而感到应更加起劲干,如李文珍说:‘我认为志愿军在前方打仗吃了很多苦,我们都比志愿军不上。想先前在地主家做长工,一年到头累个死,还要赚打挨骂,做得多又不会说你好。现在干部对我们这么爱护,我们一定要把南洞庭湖修好,这样一想劲就来啦’”。宁乡五大队民工刘景云说:“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比起志愿军的苦真不算什么,我们的苦只有在国民党统治下讨米无路才真是受苦啊!”湘潭县总队八大队十中队民工吴顺成,原来想回家,时讲牢骚话。经过“三比”教育,他愧疚地说:“比起志愿军,我真是相差太远了!”开始积极出工,以实际行动向志愿军学习<sup>[15]</sup>。

#### (二)“比”的优化:“劳动合理化”

在“比”的度上,民工表现出一种自发的合理性倾向,有意优化劳动力组合、劳动分工以及操作方法。

##### 1. 劳动力组合上的“合理化”

劳动经验丰富的民工明白,若要持续不断提高工效,在劳动力搭配上要实现最优配置,即每个劳动小组应根据不同工种合理安排劳动力。如整修堤垸这类纯体力劳动,有挖工、挑工、碾工、杂工、炊事员等工种,挑工与碾工需要青壮劳动力,挖工、杂工及炊事员对体力要求相对较低。就整个工区而言,按照体力大小合理配置,或者进行老、中、青搭配,因此,大多数劳动小组的工效维持了较高水平。

##### 2. 劳动分工上的“合理化”

合理的劳动分工也是提高工效的有效途径。整修堤垸,要按照挑土距离的远近,确定挑(土)挖(土)比例,120米左右的运距,一般是“一挖四挑”<sup>[15]</sup>,如果挑、挖比例适当,“那么挑土的人在土场里就不会等土,而挖土的人就没有时间撑锄头把,这样工效就会高,反之,就提不高工效”<sup>③</sup>。除了挖工、挑工,碾工、杂工、炊事员等人员数量也需合理安排。“精打细算,处处合理”“消灭闲人、减少杂工”“不作杂工就挑堤”,做到“人不等土、土不等人”“消灭了闲人,减少了杂工,纠正了人等土、土等人的现象,大大提高了工效”<sup>[15]</sup>。

##### 3. 劳动操作方法上的“合理化”

民工开动脑筋,想办法,在三个多月的治湖劳

动中,创造了很多合理的先进经验:李祖范小组创造了“三快一满”的办法;常德总队民工创造了“边箕倒土”的方法;益阳王海秋小组创造了“簸箕排队”的办法。“这些先进经验,对提高工区的工效,起了很大的作用。”<sup>[15]</sup>

#### 四、“比”的成效及余论

作为民工动员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一种逻辑方法,“比”的逻辑运用成效显著,提高了民工的思想认识与觉悟,激发了民工的劳动积极性,推动了水利工程的早日竣工,增强了民工的政治认同。

首先,提高了思想认识。通过比照志愿军和民工模范这两类参照点富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特点,民工逐渐认识到水利工程与自身的密切关系,主人翁精神得以激发,“更深切地体会到个人前途和祖国前途是怎样密切地结成一体,更加清楚地看到祖国建设无限美好的前途”;对工程中的困难也能以乐观主义的精神视之,“普遍认识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和集体劳动的好处,亲身的体验告诉他们:只要大家团结互助,办法就多,力量就大,任何困难都能克服”。<sup>[15]</sup>

其次,提升了劳动工效。通过比照志愿军和民工模范斗志昂扬、敢于且善于战胜困难的特征,“参与工程的每一成员都能充分发挥其劳动积极性,而使工效迅速提高”<sup>[15]</sup>。“25万治湖大军,学习李祖范小组的先进经验后,涌现了更多的模范小组。仅桃江总队就有16个小组把工效提高到每人每天6方以上,胡鸿纯小组还达到了8.21方,宁乡总队陈代杰小组在运距150米内平均每人每天挑土6.94方”<sup>[26]</sup>。1953年初,“常德工区平均工效即提高到2.26公方,比竞赛前的工效增加了60%以上。湘潭工区1月份的平均工效是1.485公方,2月份是1.885,后增加到1.919,比运动前提高94%。”整个工区“由开工初期的平均工效0.8提高到2.0方”<sup>[27]</sup>。

最后,增强了政治认同。通过比照志愿军和民工模范“听党话、跟党走”的特质,民工“了解到志愿军都是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卫国家’号召的好战士”,在工地上又“亲眼看到党和政府如何关切和救济灾民,如何爱护民工身体与关心群众生活,因此,更深刻和更亲切地了解

到毛主席、共产党、人民政府是怎样迫切地在为广大人民服务”。他们“进一步认识了党的伟大,认识了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为人民兴修这样大的水利工程,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保证治湖工程的彻底胜利”<sup>[15]</sup>,这进一步密切了广大民工与党和国家的关系,加深了他们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比”的逻辑的有效运用,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1952—1953年整修南洞庭湖工程中的民工动员中,如下因素构成“比”的逻辑的运行前提。一是国家经受住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考验。国民经济恢复,政权得以稳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渐好转,为下一步包括水利建设在内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二是抗美援朝运动高涨,国内形成“大敌压境、同仇敌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浓郁氛围,为指挥部提供了极好的“比”的参照点。三是相对封闭的工地环境和准军事化管理。25万民工集体劳动、集体生活在具有“生成运作的临时性,既定目标的合理性,组织管理的行政化,生活施工的军事化以及国家权力的依附性”的“工地社会”,“政治因素以强有力的态势”起着影响作用<sup>[28]</sup>。四是刚刚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的农民思想淳朴,热情高涨,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而且青壮劳动力几乎全部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扎实有效。注重对民工进行深入细致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思想教育,尽可能解决民工实际困难和满足其实际需求,既讲“主义”,又兼顾“利益”,有效地激发了民工主人翁精神,等等。若脱离这些背景条件,在经济社会建设民众动员中一味地照搬“比”的逻辑,或将参照点无限拔高,或任意扩大参照点与客体之间的逻辑关联,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驱动民众“比”,会在短时间内产生一定效果,但往往会因动力不足而难以持续。

进入新时代,作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领域,包括农村供水工程、大中型灌区建设和现代化改造在内的乡村水利建设正迎来“大提速”,但其群众动员的内涵内容、客体属性、方式方法等,产生一系列新特征,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也呈现一些未来发展的新趋势。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而前述个案的最大启示是,逻辑的运用离不开逻辑本身。群众动员中,只有真正符合“比”的



逻辑,注重“比”的可比性与合理性,实现从“比”的外在输入向“比”的内生转换,从“比”的庸俗化向“比”的升华跨越,才能更好地达到“比”之目的。

#### 注释:

- ① 民工和指挥部对“基层干部”的界定有所不同。指挥部所指“基层干部”包括正副大队长及教导员、正副中队长及政治指导员、正副分队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县级行政区以下的区、乡、村干部;民工以是否属同一自然村、是否劳动为标准,认为正副分队长(村干部)系本村人,和自己同吃同住同劳动,是“自己人”,不是“上面的干部”。事实上,正副分队长(村干部)在“比”的逻辑运行机制中起着关键的桥梁作用,此系他题,另作讨论。
- ② 据2007年7月15日对陈天祐老人的访谈记录。陈天祐,男,1932年生,湖南华容人,为1952—1953年整修南洞庭湖工程民工,见《“挑堤”记忆:整修洞庭湖堤坑民工口述史料(2007—2021年)》,未刊资料。
- ③ 据2007年7月17日对李冬生老人的访谈记录。李冬生,男,1934年生,湖南南县人,为1952—1953年整修南洞庭湖工程分队长。

#### 参考文献:

- [1] 刘仁健. 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动员与民众参与——以20世纪70年代淄东万米山洞水利工程“出夫”实践为例[J]. 民俗研究, 2021(6): 117-125.
- [2] 郭赛飞. 新中国成立初期防汛动员工作的困境与应对——以黄河下游地区为例[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8(5): 80-90.
- [3] 潘忠旭. 组织、保障与动员. 安徽农田水利兴修的机制考察(1949—1959)[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22, 24(4): 85-91.
- [4] 张婷. 逆境式动员:“堤坑”村庄水利治理的微观机制研究——基于湖北省L村集体化时期的口述史调查[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20.
- [5] 刘俊浩. 农村社区农田水利建设组织动员机制:变迁、绩效及政策涵义[J]. 农村经济, 2006(6): 6-8.
- [6] 周向荣. 论“比”的逻辑功能[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3(1): 101-107.
- [7] 葛荃. 比类逻辑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思维特点析论[J]. 华侨大学学报, 2004(2): 7-14.
- [8] 曾庆丰. 整修南洞庭湖工程回忆[J]. 回首当年, 2007(5): 89.

- [9] 陈向科. 1952—1953年整修南洞庭工程中的劳动竞赛[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35-41.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1488.
- [11] 彭德怀.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35.
- [12] 湖南省南洞庭湖整修工程指挥部政治部. 关于南洞庭湖工地文艺活动的报告(1953年1月9日)[Z]. 湖南省档案馆藏资料, 档案号: 203-1-3.
- [13] 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Z]. 湖南省档案馆藏资料, 档案号: 203-1-9.
- [14] 志愿军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Z]. 湖南省档案馆藏资料, 档案号: 203-1-15.
- [15] 湖南省南洞庭湖整修工程指挥部. 整修南洞庭[Z]. 编印资料, 1953.
- [16] 勉励全体治湖民工干部为祖国为人民立功[Z]. 湖南省档案馆藏资料, 档案号: 203-1-15.
- [17] 张建邦, 宁书贤. 治理南洞庭湖50周年追忆[J]. 回首当年, 2004(3): 121-122.
- [18] 整修南洞庭湖问答[Z]. 湖南省档案馆藏资料, 档案号: 203-1-9.
- [19] 湖南省南洞庭湖整修工程指挥部. 政治工作简报(1953年1月8日)[Z]. 湖南省档案馆藏资料, 档案号: 203-1-6.
- [20] 罗凤礼. 历史与心灵: 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93.
- [21] 吴鹰. 我第一个采访黄继光英雄事迹[J]. 武汉文史资料, 2012(10): 59.
- [22] 战斗在南洞庭湖工地上的青年们[Z]. 湖南省档案馆藏资料, 档案号: 203-1-15.
- [23] 徐红亮. 平江人民参加整修南洞庭湖的情况[J]. 岳阳文史, 1995(9): 96-102.
- [24] 朱开云. 想起整修南洞庭湖长堤[J]. 老年人, 2011(2): 78.
- [25] 湘潭分指挥部政治处政治工作总结(1953年3月12日)[Z]. 湖南省档案馆藏资料, 档案号: 203-1-4.
- [26] 齐寿良. 整修南洞庭湖[J]. 回首当年, 2015(9): 79.
- [27] 湖南省南洞庭湖整修工程指挥部. 关于劳动竞赛运动的报告(1953年3月18日)[Z]. 湖南省档案馆藏资料, 档案号: 203-1-3.
- [28] 刘彦文. 工地社会: 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体主义与现代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368.

责任编辑: 曾凡盛